

儒学对当前农民体育发展的影响

胡科, 金育强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2)

摘 要: 研究我国儒学对当前农民体育发展的一些影响。提出:“心性”哲学是影响农民选择体育途径的重要因素;“礼”文化对农民体育的参与态度有一定的影响;“中庸”思想影响是农民选择体育表现方式的关键因素;“乐”思想对农民参与体育起到动力支持作用;“直”思想决定了农民在体育过程中的态度。

关键词: 儒学; 农民体育; 中国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6)01-00126-04

The influences of Confucianism on current development of peasant's sports

HU Ke, JIN Yu-qia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current development of peasant's sports,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temperament" philosoph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affects peasants in selecting an approach to sports; the "courtesy" culture has a certain influence on peasant's attitude towards participating in sports; the "golden mean" thought is the key factor that affects peasants in selecting a sports expression way; the "happy" thought plays a role of supporting the motive of peasants to participate in sports; the "straightforward" thought has decided the attitude of peasants during sports activities.

Key words: Confucianism; peasant's sports; China

农民体育是我国群众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有将近8亿的农村人口, 农民体育发展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我国体育整体的发展质量, 直接决定我国体育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 在国情的制约下, 我国对体育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 把有限的资源较多地配置到竞技体育领域, 从而实现了我国竞技体育在短时期内的快速发展, 众多国际大赛优异成绩的取得, 为我国在国际体坛上确立了“竞技体育强国”的地位。然而,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优先发展了竞技体育, 其他形式体育的发展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农民体育在体育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落后了。尽管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时, 明确提出“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但是农民体育毕竟不同于竞技体育, 农民体育涉及的人群数量可能是竞技体育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 发展这么大人群的体育, 虽然不强调人人有高水平的运动技术, 但仍然是一项非常巨大的系统工程, 并且这项工程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 大力发展尚显不够更何况是“兼顾”。

当前, 农民体育发展呈现出整体水平不高、地域发展不均衡等特点, 影响农民体育发展的因素主要两个方面: 一为器物方面, 即农民体育发展所需的物质、制度条件、人力资源

条件等; 二为精神理念方面, 具体包括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等对农民体育发展的影响等。器物与文化理念两方面共同构成了影响农民发展体育的决定性因素。因此, 发展农民体育, 不管是器物上的障碍还是文化理念上的障碍, 都要求我们逾越, 否则就不能真正迎来农民体育的发展。文化理念来源于长期的社会生活映射在人们内心而形成的比较稳固的思维模式, 文化理念一旦形成且内化为群体的共同意识, 则会表现出比较强的稳定性, 并会一定程度排斥其他的思维理念, 以维持自身独特的运作方式。因此, 文化理念相对于器物将更为本质性地决定农民体育的发展。

1 儒学文化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广大的农村

儒学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 进入近代, 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下, 中国的传统儒学逐渐丧失了往日的活力而日渐势微。清末, 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 器物对比的悬殊使清朝的仁人志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高论^[1], 有了洋务运动、有了北洋舰队, 但最终还是在与西人的武斗中败北, 于是, 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光有器物之利, 还不能抵御西人, 于是又有了后来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制度层面引进了西方的一些工商经济、军事行政、文化教育措施,维新一派则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但后来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人们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更深层次的从文化方面向西方学习,彻底地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由此,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涌进了中国的国门,中国文化开始了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近代轰轰烈烈的东、西文化交融,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的文化不断经历着改造与重塑,新儒学、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在各大学、各主要城市进行激烈的交锋,但作为以农业耕作为主的广大农村社会,却依然保持着那份固有的宁静,永远过着那种简单的生活,永远都不必卷入复杂的文化纷争。因此,农民依旧以以往那种淳朴的方式,延续着世代相传的生活,实践着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根深蒂固于广大农村的传统儒学思想才受到较为猛烈的冲击,后来一系列的政治斗争,都几乎使得儒学走到了崩溃边缘,但毕竟延绵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有其独特的生命力,糟粕的部分被革去了,精华仍然所在,浓重的人文精神依旧活在人们心中,传统美德如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等^[2]依然大放异彩,以至现代,在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日渐出现人性危机时,杜维明等儒学大家奔走呼吁以期望实现东方儒学的复兴。

2 农民体育发展过程实际就是不同体育文化理念的融合与冲突过程

体育运动的产生具有地域性特征,形形色色的体育运动方式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根源于地域的文化特征,在充分融合了各自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心理特征的基础上,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如健身、宗教、娱乐、军事、劳作等而形成具有强烈地域文化特征的体育运动形式。因此,体育运动的传播不但是体育作为实物形态、运动方式、规章制度的传播,从更深的文化层次分析,体育运动更是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的载体而传播各个区域独特的优秀文化。因此,要分析与研究不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不同体育运动形式的交流,分析与研究不同体育形式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就不能不研究隐藏在具体体育形态中抽象的文化理念,否则就不能真正理解不同体育形态融合与冲突的本质原因,就不能真正解决现代体育全球化、普及化的难题。

农民体育的具体实践,从区域体育角度来看,主要分两类:一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践;一为对域外体育的实践。解决农民体育发展问题,主要就是解决这两种类型的体育在广大农村的实际发展问题。而这两种类型体育在农村的发展,则表现为国内多民族体育文化的交融和中外体育文化的交融。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五千年的辉煌历史抚育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在国内的多次文化融合中,如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游耕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等^[3],尽管不断发生文化的同化与异化,但传统儒学作为中华大地的主流文化永远都是占据主导地

位,蒙、满两民族靠武力入主了中原,但在文化上则被汉文化所逐渐同化。表现在体育层面则是形成了以儒文化为根本特征的价值上的统一,形式上多样的中华体育文化。如果说国内多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多于冲突,那么,中西体育文化则是冲突多于融合。国内部分少数民族文化自始至终都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与发展的,而中外文化则是植根于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哲学立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育文化的差异则是巨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心性”之学主张“内索”,表现在体育上,则崇尚静养,涵修“德”于练“体”中,修身的过程讲究养性;西方文化则一开始就把天人两立,主张“外求”,把人的目的建立在认识自然与征服自然之上,强调人的外在超越性,表现在体育上,则强调健壮的体魄,主张“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崇尚竞争,崇尚自我超越。

“天人合一”与“天人两立”是矛盾的,“内索”与“外求”是矛盾的,“心性”与“体魄”也是对立的,因此在中国广大农村发展西方体育,推行西方健身观念时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3 儒学对当前农民体育发展的一些具体影响

我国传统儒学对当前农民体育发展的影响是多元的,它以潜在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农民体育发展的方方面面:“心性”哲学对农民选择体育途径的影响;“礼”文化对农民参与体育态度的影响;“中庸”思想对农民体育表现方式的影响;“乐”思想对农民参与体育起到动力支持作用;“直”决定了农民在体育过程中的态度。

3.1 “心性”哲学对农民选择体育途径的影响

中国传统儒学与西方哲学就心灵的问题有不同的态度,中国传统儒学认为善存在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扬善只需内索即可,无需外求于外在的物质世界。如王阳明所谓的“完美自足”^[4],孔子所说的“仁心”也是这个含义,往内求索所发现的善心即是“天心”,因此求善与获取天道成为一体,由此就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的哲人均强调修身养性;西方哲学则设定人是不完善的,从而外设一个精神实体“物自体”亦或设立一个主宰人类且全智全勇的上帝,人的目的是从外在的途径寻找善,因此,从一开始,人与自然成为了对立体。

根源于“心性”哲学的中国体育文化表现出较强的伦理趋向性,深藏于人类自身之内的价值之源,是一个无尽的宝藏,只要向内深深地挖掘,它便可以发扬光大,甚至充塞于天地之间。因此,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其诚,善莫大焉。”^[5]于是,修身、养性、强体三者统一起来了。涵养道德的过程既是向善的过程,也是使人融于天地之间的过程,修身、养性一旦与天道融合,则人完全可以从天地间获取源源不断的养料,这也是健体的过程,即“富润屋,德润身,心宽体胖”,于是,人们崇尚静养,涵修“德”于练“体”中,修身的过程讲究养性。同时,修身、养性与强体的过程中强调“静”,主静的原则是周敦颐修涵养道德的基本方法。主静即无欲,周子说“无欲故静”,此处的“静”无疑与其宇宙动静变化的原则是一致的^[6]，“静”才能求善、得道,从而健体。至宋代,张横渠提

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7]，把世界本原视为“气”，“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毁”，由此，为吐纳练气健身之法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气功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健身手段，通过吐纳之法，达到从宇宙获取涵养的境界。源于伦理哲学的中国传统健身理念成为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健身之道，静养与修身养性并进成为了这种健身方式的重大特点。区别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内在超越，西方文化强调的外在超越性，决定了其对人生二分的倾向。因为外在超越性表现了强大的外在力量，人被这种力量所支配和驱使，人力求战胜它，遂呈现了人生与外界的拼搏和斗争。表现在体育方面，则是强调竞争，向外用力，征服他人，征服自然，重视动的过程，强身健体的过程与涵养心性则不存在必然联系。

3.2 “礼”文化对农民参与体育态度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好礼，有礼，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2]。《礼记·冠义》：“礼”不但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作为伦理道德规范，其衍生出的一系列的纲常、秩序，规定了人们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待人处世的方法。中国传统社会所讲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女子所施加的“三从四德”以及对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严格规范都是“礼”的具体表现，在“礼”的规范下，中国成为了一个礼节繁多的等级社会。西方社会崇尚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以此为逻辑起点，西方体育在社会人员以平等地位并广泛参与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发展、传播。而中国传统的体育活动形式表现出较强的等级性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礼”的思想一方面丰富了农民体育活动的文化内涵，在每次体育活动之前，都有一系列隆重的欢庆仪式，这些仪式的进一步演化成为了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一些礼节的存在，可以有利于形成恭让谦和的良好体育作风；另一方面，由“礼”所产生的等级制度却极大的限制了体育运动的参与对象，曾一度使得普通的体育运动形式存在一定的准入门槛，长辈与晚辈、男人与女人不能同场竞技，因此，极大地限制了农民体育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人平等理念的大力倡导，使得那些一度为显形的等级规范，退缩到人们的内心之中，虽然，长辈与晚辈、男人与女人同场竞技不再被认为是失体统的事情，但中国人强烈的面子观念从自我的角度为个体设置了一道樊篱，长幼之间、男女之间、强弱之间既然胜之不武、败之不荣，还不如索性不参与，这种消极心理存在于人们心中，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对体育的参与热情，不利于农村体育人口的增加，从而阻碍农村体育的发展。

3.3 “中庸”思想对农民体育表现方式的影响

贵和谐，尚中道，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西文化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中国传统儒学崇尚“一”而“统”，处处讲和谐；西方文化则注重“多”而“析”，强调分别与对抗。“中庸”的“中”，是恪守中正之道，不偏不倚之意，“庸”是常的意思^[8]。人如能恪守中正之道，则万事万物就能各得其所，就能万物化育。由“中庸”而讲究“和”，主张不同元素的配合，以实现矛盾的均衡统一，达到“尺有所长，寸有所短”，通过调

和，各取其长，收到和谐的效果。中国传统文化在充分肯定“和”的价值同时，形成了“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能够兼容并收的处理一切纷争，由此产生的体育观则是消极对待竞争，纵有竞争也是通过竞技体现“礼”的价值，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9]。《论语·为政》君子本应该没什么可争之事，如射箭之事，合乎礼仪，也可算得上君子之比赛。竞争通常只能打破常道，能“破”但不能“立”，因此，传统体育更多的注重展示性，即把自我最完美的方面表现出来，长处得以张显，亦不必破坏整体的和谐性，也是一种“善”，于是表演性的运动项目找到了滋润的文化养料，获得了充足的发展空间，武术、舞龙、舞狮、杂耍等项目也成了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的运动形式。依此为根据，抛开生理学的解释，则完全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诠释中国在体操、跳水领域的优异表现。然而，现代竞技体育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讲求竞争性，强调通过公平基础上的竞争，以不断实现超越。西方文化所确定的人性是不完善的，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人性容易走向衰微。因此，有必要人为的制造一个竞争环境，让人不断地参与竞争，同时强调竞争越激烈越好，越激烈的竞争越能把人性最伟大的一面展示出来。可以看出，在对体育的价值判断方面，中西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中国肯定调和，西方强调竞争，在广大农村普及西方体育项目时，应充分考虑到西方体育项目深层次的文化价值与中国儒学深刻影响下形成的文化价值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

3.4 “乐”思想对农民参与体育起到了动力支持作用

如果说佛学精神否定今生，认为今生是苦，唯有把希望寄托来世，那么中国的儒学则是一种快乐哲学，处处表现着一种豁达的人生观。《论语》一书，开头便是“子曰不亦乐乎”，而且全书都流露出一种和乐的人生观，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等，“乐”是一种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表现^[10]。儒家先圣强调人应效法“天”，像天一样生生不息，刚健有为，于是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圣训，从乐逐渐引出了一种积极乐观的人身哲学，时时刻刻激励着中华儿女乐观、向上，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如此伟大的人文精神，在中华民族面对任何艰难困苦时，都没有向困难低头，而是以更为积极、乐观、坚毅的人生态度去战胜困难。

如果说乐(LE)是主体对自我的一种积极人生态度，那么乐(YUE)则是人把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的进一步泛化，由主体引向客体，达到主客之间一种和谐的呼应，人心是乐的根本基础。《礼记·乐记篇》曰：“凡音之起，由人心而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行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11]。声、音、乐组成了相关的三个层次。乐思想的进一步延伸，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礼”是维护封建等级、个人尊严的价值原理，“乐”则成了调和社会各种关系的原理。

“乐”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对农民参与体育起到了动力支持作用。无论是最初的参与体育，还是参与体育以后进一步维持体育行为，都是由“乐”所驱动的。表现在最初的体育动机上，人正是由于向往一种身体之“乐”，群体和谐之“乐”，人

物融合之“乐”,而积极的融入体育之中,《孟子》中有这样一段话:“‘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11](《孟子·梁惠王下》)可以看出,几千年以前的儒家思想中就有了“独乐”不若“与人乐”,“少乐”不若“众乐”的思想,把体育当作一项集体的文化活动,参与其中获得绵绵乐意从而促使人们积极的参与体育活动,从历朝历代具有传统体育意义的庙会的人山人海现象足可证明“乐”对人们参与体育的驱动作用。体育作为一种心理意志的训练手段,被人们广为接受,同时,体育运动反映的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人生态度,通过一定的身体手段,通过一定逾越困难的心理体验,使人体体会到体育之中积极、乐观、向上的价值。体育运动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表现形式,融声、音、乐于一体,在充分表现人、物和谐之美时,把一种和乐的优美体验传达给每个体育参与者,不但陶冶了行为者的品性,而且使体育参与者加深了对人生之乐的体会,而这种正向的体会无疑成为了一种强大、恒久的动力,维持着人们对体育活动的兴趣。

3.5 “直”决定了农民在体育过程中的态度

儒家讲“礼”注重“礼之本”,而礼后之本为人之真性情,如果外显之“礼”与内存之“本”,不一致,则为虚伪之礼,娇柔之善^[12]。故孔子注重人之有真性情,恶伪善,尚质直,直者即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心有所恶而如其实以出之者也。直为个人之规范,礼则为社会之规范,如能以真性情而行礼则可为君子。由直可以有“诚”“信”之论,“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真实无枉是天道,而对诚的追求则是人道;而“信”则是强调言行相符^[12]。

“直”的思想从根本上影响了农民在整个体育过程中的态度,究竟人以什么样的态度贯穿于体育运动的始终,就是“直”所要回答的,“直”是体育伦理的主要内容。每种类型的体育运动经过长期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行为规范,西方体育对于竞赛的规章制度有更为严格的要求,行为规范存在于运动之中,是为比赛营造一种相对公平的环境,但参与者通过一定的手段,非法获取比赛的成绩是往往可能的,更何况现代体育活动都被融入了一些功利的因素,获取优异成绩即预示着可以获得相应的名、利回报,利益的驱动使得有些运动员不遵守体育纪律非法获取体育的利益,于是就有了现代运动比赛中的种种丑闻,如兴奋剂事件、贿赂裁判事件、赛场运动员打架事件等。农民体育的开展是在一个最纯朴的社会群体中开展最神圣的社会活动,理应是远离体育丑闻,但随着现代体育一些功利主义思想的传播,使得农民体育也不再那么纯洁。农民体育如不能回归纯洁,消除一些不正当的体育作风,则可能严重腐蚀农民体育的根基,同时,我国的广大农村作为竞技体育人才的初期培养地,不良体育精神的存在可能会随着农村运动员的流动而带入竞技体育领域,则对于竞技体育的长远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直”的思

想要求在体育运动过程中,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观众均以一种“不自欺、不欺人”的态度对待体育,以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参与体育,以诚待人,以信取人,共同维护一个纯洁、神圣的体育环境。

中国传统儒学作为一个影响了2000多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庞大思想体系,以其独特且顽强的生命力,还将继续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现代发展历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曾经是传统儒学扎根最深的区域,儒学精神深入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体育作为农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时代的召唤下,迎来了自己的最佳发展期,如何从文化理念角度,进一步发扬传统儒学的优秀精神、克服其落后、消极的精神,以促进农民体育的发展已成为体育理论研究者急待解决的难题,为此作者做出了尝试,还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踏入到这条艰巨的道路上来。

参考文献:

- [1] 卢风.应用伦理学导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26-37.
- [2]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0-226.
- [3]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7-97.
- [4] 蒙培元.中西哲学对心灵问题的不同看法[A].张岱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96-308.
- [5] 李中华.论东西文化的两种超越观[A].张岱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09-322.
- [6] 李道湘.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8-25.
-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28-233.
- [8] 王媛.大学·中庸[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127-128.
- [9] 麦晓颖.论语[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21-33.
- [10] 熊传善.中西印文化比较及其发展前景[A].张岱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52-262.
- [11] 余项科.“乐”的社会政治功能[A].张岱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69-384.
- [1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8-63.

[编辑:邓星华]